

四 海 之 内

李约瑟著

劳 陇译

文化生话译丛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李约瑟著

劳 陇译

文化·生活·译丛

四海之内

SI HAI ZHI NEI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英]李约瑟著

劳 陇译

Within the Four
Seas The Dialogue of
East and west by
Joseph Needham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根据英国艾伦·温文书屋
英文版译出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2,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20,001—30,100

定价 6.80元

ISBN 7-108-00573-5/G·106

文化生活译丛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 刷 者

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篇

译者前言

李约瑟博士是当代英国最卓越的汉学家。他原来是生物化学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任剑桥大学冈维尔及凯厄斯学院院长。后来，在一些中国科学家朋友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汉文，潜心研究汉学四十余年，博览群书，于哲学、文学、科学、技术各方面无所不窥。抗战期间由英国政府派遣，领导英中文化科学协会代表团来华工作四年，遍访中国各地文化古迹，结识了不少中国学者，搜集了大量图书资料。他以半生心血，编纂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中国科学与文明》，已出五卷），内容丰富，考据精详，共推为空前巨著。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英中友好协会及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曾四次来华访问，对中英文化交流作出很大贡献，我国科学院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本《四海之内》是他二十五年来所作论文、演讲稿的选编。书中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之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哲学、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探测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道路，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精辟的见解。书中并包括他历次在中国访问时所写的诗歌，抒发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爱慕之情，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伟大成就，充满着真挚的感情，读之使人有所启发。当然，书中也有些论点，不太全面或不太确切之处，读

者可以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意见，共同商讨。原书有几篇文章和诗歌因与中国文化关系不大，故未译出。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1
2 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	23
3 中国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	86
4 赠路易·艾黎诗(效其诗体)·····	96
5 四川的道路·····	100
6 孔子诞生 2500 年纪念·····	104
7 在长安孔庙中·····	110
8 中国文化中的圣人·····	113
9 在公主墓前·····	118
10 科学与和平——亚洲局势·····	120
11 友谊的芬芳·····	124
12 赠中国友人诗·····	133
13 西方对东亚的错误认识·····	137
14 东方和西方的心理学和科学思想·····	147
15 朝拜圣地，再到千佛洞·····	156
16 从亚洲观点看科学与宗教·····	163
17 基督教和亚洲文化·····	174

1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节录 1955 年英中友好协会主席演说词

三千年来旧世界的东西两方一直在进行着对话，彼此给予很大的影响，但是双方所形成的文化却是迥然不同的。现在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世界上的问题，如果只从欧洲人的角度去考虑，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我们必须从外部去观察欧洲，必须通过全世界人类中更广大的一部分人，即亚洲人（当然还有非洲人）的眼光来认识欧洲的历史，不但要认识欧洲人的成功，而且也要认识欧洲人的失败。

傲慢与偏见

在西欧以及欧洲体系的美洲的许许多多人深受所谓精神优越感之害。他们坚决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文明才是唯一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他们对于其他人民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传统一无所知，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无论在法律、社会民主或政治体方面）都强加给其他的人民。但是他们所宣扬的那种文化本身却多少带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性质，因为欧洲人始终没有能够把物质与精神，理想认识和浪漫精神，这两方面调和起来。他们的那种生活

方式势必要侵蚀或者破坏其周围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而后者有一些却可能含有更为合理的生活准则。

由于西欧现代科学技术的勃兴，给人们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控制自然的力量，从而使美洲人和欧洲人产生了一种似乎不自觉的统治心理。随着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的兼并侵略，军事征服，以及“远征讨伐”的胜利，这种统治心理就更加根深蒂固了。所以，今天欧美的生活准则之得以广泛传播，实际上，是在原子弹蘑菇云阴影的威胁下，在勃伦式轻机枪的枪口上实现的。今天的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并不亚于当年的十字军。实际上，即使在十字军时代，伊斯兰的文明从整体上说已经超过了欧洲的文明。不过那时候基督教的狂妄自大只不过荒谬悖理而已，而今天却成为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

普遍性与优越性

有人说，欧洲文化与其他一切文化不同，它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它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因而具有更高的优越性。由于这种“优越性”，所以据说欧洲文化的扩张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看来西欧文化还要不断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而其他的文化只能局限于某一地区，甚至要保持它原来的地盘也很困难。

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作出了普遍性和优越性的结论，这是很可引以自慰的。但是，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可否认欧洲的文明确实产生了现代用飞机(机翼)和无线电(电波)统一起来的世界整体。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是法律家，神学家，政治家和著作家所造成的，而是工程师

和科学家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现代的“欧洲”世界文明中到底哪些部分是具有普遍性的，哪些部分是地区性的，局限于欧洲的？只要问题正确提出，其答案就不言而喻了。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以及形成这种科学技术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必须清楚认识，欧洲所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或者“西方的”科学，而是普遍适用的世界科学。*

试看，一切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无论来自任何种族或任何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相遇，他们都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他们说的是共同的语言，认识的是共同的真理。因为自然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一切人类，不论种族，不问性别，只要受到应有的培养教育，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自然的真理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业。自然的观察家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组织。尽管你潜入九渊之下，那里还有你的兄弟；尽管你扶摇直上九天，你的飞机驾驶员可能是一个中国人，副驾驶员可能是一个印第安人，而领航员却可能是一个非洲人。如果你蔑视任何一个人，那你蔑视的并不是人——而是自然。犯这样的错误的人是难逃惩罚的。

所以，欧洲中心论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隐含着一一种武断

* 特别有趣的是，当耶稣会教士把现代科学从欧洲引进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一开始就注意到这种区别。大约在1640年，北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引进的新科学从根本上说到底是“西学”还是“新学”？耶稣会教士们强调它的西方根源，因为当时他们宣扬的宗教在中国人看来是属于西方的，所以教士们想利用同时引进的科学的威信来支持宗教的传播。但是，中国人反对在教士们编纂和翻译的书籍上用“西”字。后来光绪皇帝上谕诏示，书名一律取消“西”字，改用“新”字。

的臆说：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确实产生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任何欧洲的东西无不具有普遍性。^{*}准此而言，罗马法“当然”就是人类在法学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希腊哲学（不言而喻）是人类所能探索到的最接近于真理的哲学思想；我们的宗教（以至与其有关的种种关于时间，地点，和理论的细枝末节）都是全世界各地人民都必须信仰的真理启示；欧洲的雕塑与绘画当然是“最标准”的雕塑绘画，是其他一切文化的艺术家们所努力追求而不能达到的目标。欧洲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而其他的音乐只是代表不同的人类特性。凡是为欧洲（或美洲）的普通人所欣赏的东西（电影、图书以及生活方式），也应为其他一切的人所欣赏。

这种隐含的武断臆说必须迅即予以彻底纠正。有些人往往认为只有西欧的文明才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如果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归于中国。中国浩瀚的二十四史追溯到纪元前 90 年，集国家主纂的（但大部分是私人著述）历史文献之大成，是世

^{*} 有些著名的欧洲学者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全世界胜利传播，欧洲文明中的世俗（非宗教）部分也以一种残损不全的形式广泛传播。但是他们看到欧洲的宗教观念却受到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坚决抵制时，心中不免感到难过。因为这些学者们认为基督教世界的文明按理说是和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分不开的，前者是后者必然的伴生物。他们的这种想法，如果再推进一步，可能就要再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运动，将欧洲的宗教以更完备的形式强加给世界其他的一切人民。他们的旗帜上可能还是画的十字架，可是掌握旗帜的，不用说，自然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了。到底现代的科学技术所依附的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确切地解答，虽然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的伟大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们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现代的中国学者无疑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答案。但远西的学者们却至今还未能认真地提出任何其他答案来。

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的。此外还有一些篇幅比二十四史略小,但仍然是很浩大的历史典籍,如《资治通鉴》(公元11世纪)及《文献通考》(公元14世纪)等等。即使我们把“历史价值”理解为“历史学说”的话,那么,欧洲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能说是最早的伊本·凯尔东*比维科**还要早大约三个世纪。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哲学上中国以“天不变”的观念为最高准则,这和中国文明的“静止”性是一致的。这种说法也是不确当的。所谓“不动的运动者”基本上是希腊的观点,而中国的“道”的涵义却是永恒不息的运动,正如天体的周日运行一样。当然,在中国和希腊的文明中都可能找到动和静两种价值观念的实例。在中国的文化中从来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只是它有两个特点(1)就语言和文化的一贯性和独特性而言,它的历史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也有以色列可以与之相比), (2)中国没有发生过象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社会现象,以及当时和后来所产生的那些变革。中国的文化,和其他各国一样,有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有相对静止的时期。

今天欧洲人必须认识,他们的亚洲兄弟们应该和他们分享现代科学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无穷福利(现实的或潜在的)。但是他们决不能再勉强亚洲人接受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那是与亚洲人固有的伟大文明格格不入的。同时,刚刚觉醒了非洲人民也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向非欧洲人借鉴。欧洲

* 伊本·凯尔东(Ibn-Khaldun),1332—1406年,阿拉伯历史学家。——译者注

** 维科(Vico, Giovanni Battista),1668—1744年,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

人应该遵循那些先进人物所开辟的道路，如象艾伯特·施韦策那样的博士，路易·艾黎那样的教育工程师，诺曼·白求恩那样的外科医生，和维里尔·埃尔温那样的社会学家的道路。他们决不能再以汽油弹，饱和轰炸和原子弹发明家的面貌出现在全人类中最大多数人的面前。

科学这种东西只能由全世界人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方式共同享受。说实在的，科学的基石也并不只是欧洲人，而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所共同镌刻和奠定的。各国人民应该自由地发挥他们自己千百年形成的思想体系的内在效能，决不能勉强地去接受欧洲的思想方式，更不能接受欧洲现代庸俗化的思想。欧洲文化应该和其他兄弟文化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为人先，不为人后，一律平等，毫无差别。”

不可否认，欧洲人要接受以上的观点还必须作一番精神上的努力。我们常常听到西方人说，亚洲人只是抄袭了欧洲的智识和技术成就；其含义就是说，欧洲人辛辛苦苦创造了一切现代科学的器械设备，而亚洲人只是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基础上坐享其成。但是这种历史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不正确的。学习应用现代技术决不是简单的模仿，学者必须要懂得它的理论依据。自然界的知识永远不是静止的，也永远不会有尽头的，所以很多学习者必然会有所发展而扩大其领域。而且，有人认为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是完整的在文艺复兴的母体中形成而诞生出来的，这种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现代科学的诞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欧洲曾经吸收了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

伽利略的物理数学理论，如果没有印度的记数法就很难设想出来。他在那里发表他的改变世界的伟大谈话的那个兵工厂，如果没有掌握中国的铸铁技术就不可能建造起来。而且，欧洲早期的科学发展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艰难困苦；有些时候，往往在解剖刀一举之间就产生了伟大的发明——只要你掌握了发明的基本技术。所以，欧洲人要把科学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极其荒谬而且不可能的。科学不是欧洲人可以利用的一种手段，借以使他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的人民。科学也不是欧洲人所能享有永久专利的东西。^{*}科学总是属于全世界的人类社会的。

无知与历史

骄傲往往随着无知而来。所以，毫不奇怪，至今有些欧洲人，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对于亚洲人民的历史和思想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的根本不感兴趣。在西欧的大学里面，关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不受欢迎的冷门课程；

^{*} 在1951年的波斯石油纠纷中，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张英国报纸上头版大字标题写着“掠夺石油的人们”字样。我仔细一看，不觉大为诧异，原来上面所提到的人物并不是那时候还控制着波斯石油的那些外国人，而是波斯的总理莫沙特兹博士和他的主张石油国有化的同事们。这种是非颠倒的提法，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来，也许可以说是适当的，但是我乍一看到不免觉得惊奇。我想那些外国掠夺石油的辩护士们肯定会提出理由来辩护；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企业，那些石油很可能至今仍埋藏在地球深处，一无用处。这种说法无疑是符合于历史事实的。但是非欧洲人民决不会承认欧洲人，无论过去或现在，有任何理由可以利用他们高度发展的技术，为自己的利益去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资源。

即使有人攻读，也只把它当作一种已经消逝的事物来研究，好象与当代世界毫无关系。听说英国有些发言人坚持，因为只有我们英国人懂得民主的真谛，所以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其他非欧洲人民，至少殖民地的人民，即使使用武力，亦在所不惜。但是，如果你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伊本·凯尔东所说的印度乡村自治会，或者伊斯兰的会社组织；孟子所说的“诛暴君的权力”，唐代的文官考试制度，或者，御史道（“监察机构”），*他们就瞠目不知所对了。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印度或者阿拉伯的历史中最基本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在联合国（处境非常可怜）组织中的欧洲人或者美洲人觉得要把自己的观点（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观点）强加之于其他国家的代表，那似乎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视而不见的），那些国家是极其悲惨而卑劣的，因为它们还不具备现代工业的全部力量。

再谈谈语言的问题。在马来亚有一种最最不好的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的公务人员几乎没有什么人觉得有必要学华语。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官吏中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那

* 所谓“乡村自治委员会”（panchayat）自然就是指上古和中古世纪印度乡村中自动选举出来的五个长老所组成的委员会。所谓“伊斯兰会社组织”（asabiyah）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帮会和行会组织，据“社会发展历史之父”伊本·凯尔东（14世纪）的考证，这种组织是形成早期伊斯兰国家的萌芽。孟子在纪元前4世纪就指出了诛暴君和弑明君的区别，认为前者是正义的行为，而后者是罪恶的勾当。中国在纪元前1世纪就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这种制度，现在普遍认为就是法国革命以后欧洲和美洲所引进的考试制度的典范。御史道是中国的一个政府组织，派遣“监察人员”分赴全国各省，作为皇家的代表，有权监督检查报各省官吏是否公正廉明。他们往往尽忠职守，不顾生命危险，成为戏剧文学中经常歌颂的题材。

些国家的语言的？在北非的法国官吏有几个是熟谙阿拉伯语言的？战前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的那些外国商人难得有几个愿意认真学点汉语可以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谈谈话。最近英国有一份著名的科学文摘杂志的编辑，虽然他也想要一些现代中国刊物的资料，可是他不愿意摘要登载那里面的文章，除非原来就有了英、法、德文的摘要。虽然说中文早就列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可是这种情况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世界文学的领域里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非欧洲人，不懂欧洲语言，站在英国博物馆大厦的拱顶之下，看了那浩如烟海的图籍，感到莫名其妙，大家一定要笑他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文学可以与欧洲文学媲美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例，可是绝大部分欧洲人对此却是一字不识。在这一点上说，他们自己不正是野蛮人吗？确实，有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诗歌已经有了很好的译本，但是从门类和内容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的无知不仅表现在政治历史和哲学历史方面，而且也扩大到科学技术的历史。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高度学术性的问题。其实不然。如果说，科学真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统一因素，那么，科学史就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举例说，在泰晤士报上有一位作者，就是英国博物馆的东方书籍及稿本保管者，在1952年谈到敦煌的稿本时说，虽然中国在第8世纪就有木版印刷，但是活字版却是后来欧洲人发明的，这显然是信口胡说。活字版是毕昇（公元1060年）发明的，他用的是陶瓷，而朝鲜人在14世纪末就用活字铜版印了大量书

籍，那比古腾堡*还要早一些。可是在梅因斯的印刷博物馆中对于中国的发明一字不提，我国纪念展览会的组织者也不愿意承认这一情况。

人们大多不知道欧洲在技术上取得优越地位只不过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马可波罗（大约纪元后 1280 年）发现当时的杭州，和他所认识的欧洲相比，简直就是个天堂。直到 1675 年俄国沙皇还得聘请中国的桥梁工程师去工作。在 19 世纪初期以前，中国对于欧洲的产品简直毫无需要，而，相反地，欧洲却派遣了不少的调查团到中国去探求中国传统工艺（如陶瓷，纺织，印染，茶叶，漆器等等）的奥秘。

就我们的世界观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所产生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看法。如果说伽利略和维塞利亚斯，牛顿和莱布尼茨，费伊泰和哈维这些大科学家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种种族的和遗传的特征所产生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确实可以说是优秀的民族，而我们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也许就会认识到，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也许和欧洲的社会结构很有关系，因为欧洲的社会结构确实和亚洲的封建官僚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其他的民族由于社会情况不同而缺少培育科学的土壤，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拒绝和他们分享科学的成果呢？如果再进一步探讨，也许会认识这种不同的社会条件可能和不同的地理环境有关。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断定其他民族的男女不可能成为欧洲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和

* 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1398—1468），德国活字印刷术发明者。——译者注